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  
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 —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9

ISBN 7-80070-835-7

I. 中…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经济史-史料-中国-1953—1957-汇编 ②农业经济-经济史-史料-中国-1953—1957-汇编 IV. F129.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2797 号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农业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央档案馆 编

\*

中国物价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37.75 字数:980 千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70-835-7/F·631

印数:0 001—1 000

定价:98.00 元

本课题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  
档案资料选编》编辑委员会

顾 问 薛暮桥  
主 编 刘国光 王 刚 沈正乐  
副主编 董志凯 (常务) 陈廷煊  
刘美玲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刚 刘国光 刘美玲  
匡家在 沈正乐 陈廷煊  
易全金 武 力 赵学军  
赵增延 徐建青 剧锦文  
董志凯

# 总 序

刘国光

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积累和磨炼，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 21 世纪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辰 50 周年、新世纪将要到来的时刻，我们抚今追昔，总结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我们面临世界性现代化潮流中的竞争和挑战，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为了这个目的，需要深化改革、调整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不仅要学习国内外一切先进的思想理论、管理经验、科学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将其与中国的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一历史使命越来越迫切地摆在我国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面前。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谙熟国情，了解自己，系统地、深入地、有创见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科学地总结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则是必要的前提。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合作编辑的大型经济学术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就是为全面地、完整地回顾与总结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奠基和铺石。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的续编。

《1949—1952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央档案馆通力协作，科研人员与档案管理人员一起，查阅了数以亿计的档案资料，含辛茹苦，历时八载才编辑成的。全套丛书包含 12 卷，内容达千万字以上，于 1996 年底全部出齐。该《选编》的出版，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经济背景、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经济运行提供了丰富的详尽的学术资料，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在此套丛书的基础上，已经产生了一批有新见解的国史、党史和经济史的科研成果，预计还会有更多富于创见的新成果问世。

《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所涉及的 1953—1957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阶段：1953—1957 年，我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苏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支援下，主要依靠我国人民自己的努力，克服了资金、物资、技术力量和管理经验严重不足的重重困难，进行了以 156 项为中心的 700 余项重大工程建设，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使国民经济出现了工农业协调发展，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的兴旺局面，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从此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与此同时，我国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个时期逐步确立。1956 年中共八大前后，党和国家又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的探索。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孙冶方、薛暮桥等经济学家均对三大改造以后的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变革的意见。当时的历史条件（国际的敌视、孤立与封锁，国内生产要素匮乏，产业结构失衡，缺乏经验等）形成了这个时期的工业化建设尚需服务于新生政权的建设，服务于建立强大的国防和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这一特殊目的决定了不得不把发展重工业置于首位，并且实行以行政命令为主体的计划管理体制。时过境迁至今日，我们看到这个时期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也有曲折

与教训。对其间“三大改造”等重大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尚不尽一致。然而，真理总是越辩越明，理论总是在探索中发展的。本丛书的编辑与出版，将披露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于真理的辩证和理论的发展必然产生推动作用。

在性质与体例上，这套丛书与1949—1952年部分一样，仍是一部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料的大型学术资料系列丛书，兼有资料性和学术性双重意义。一方面，书中正文内容全部采用原始的档案资料，在编辑过程中严格维护文献原意，对重要文献资料力求兼容并蓄，毋使遗漏，并且为读者进一步深入探索提供详尽准确的来源和出处。另一方面，编者对汗牛充栋的文献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分析，在此基础上，按照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体制演变、经济运行各个环节等方面分门别类，设立卷次，详列纲目，按类编排成书；在编排的过程中注意到历史和逻辑的结合，每一卷资料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使读者一目了然，便于比较分析和研究，而不同于一般的文件汇编。它兼有资料性、学术性和科学性。可以说，也是一种形式的经济史书，而且是一件具有开拓性的工作。

这部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得到了国务院、国家各部委档案部门的热忱支持，并承蒙当年领导我国经济建设的老同志的谆谆指教，在此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和谢意。

由于这是一件开拓性的工作，加之档案资料的分散和统计资料的不完备，编辑工作必然有诸多不足和不尽如人意之处，恳请读者提出批评建议，以待再版和续编时改进。

1998年1月



## 凡 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是一部大型经济学术资料系列丛书，也是一部工具书。编辑的目的是为经济决策部门、经济工作者和从事经济研究、历史研究以及教学等方面的人员提供比较系统全面的经济档案资料。

二、本丛书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顺序编排。继第一批 1949—1952 年档案资料编辑出版之后，第二批为 1953—1957 年即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档案资料。全书力求全面系统地收集选录 1953—1957 年我国经济工作中有关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力发展、经济管理体制演变以及生产、流通、分配、再生产等经济运行诸环节的主要档案资料，反映该时期我国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

三、全书按专题立卷，包括综合、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通讯、财政、金融、固定资产投资和建筑业、劳动工资和职工保险福利等卷。部分卷的内容间或交叉，但从各卷的特点出发各有侧重。

四、每一批丛书有《总序》，反映该批档案资料编辑的宗旨、目的、意义及其共同点。各卷写有《前言》，概述该卷的基本内容；书后附部分资料索引。

五、各卷的结构大体一致，一般采用纲、目、子目三个层次，按“第 X 部分”、“一、二、三”、“（一）、（二）、（三）”排列，部分纲目设立分子目，按“1、2、3”排列。

六、由于按专题立卷设纲目，并为确保材料精炼，增加信息容量，对档案资料大部分采用节录、摘录处理。凡采用主要内容者题目在文前，出处在文后；凡局部采用者，题目、出处在文后。为便于读者了解档案资料原貌，尽可能整段选编，并对删节之处注明 [上略]、[中略]、[下略]。对部分人名、事件资料及已变更的地名，在页下加以简要注释，按页编序号。在每个子目之中，资料一般按时间顺序排列，并照顾事件、逻辑相关者放在一起，以便查阅。

七、凡属编者加在行文中间的文字，均加 [ ] 号；凡为遗漏字，在该字后面加 [?] 号；残缺或模糊难辨的字，用 □ 号表示。

八、各种资料标题下的日期以及资料出处的日期一律使用公元，用阿拉伯数字表示，资料中的年代日期和数字，一仍其旧。

九、1955年3月1日我国币值改变前的资料中的货币单位为旧币，10000元相当于1955年3月1日改变后的1元。本书中的货币单位和其他计量单位维持档案资料原貌，请读者注意资料形成日期，加以分辨。

十、资料出处置于该件资料之后。为节省文字起见，档案资料出处以字母和数码代之。字母为档案资料保存单位，数字为档案资料分类编号，括号内为资料书的年号、卷次等。书后附录中有代码索引。各卷并附相关《要事年表》。

# 前 言

陈廷煊

## (一)

本书编辑了1953—1957年间，我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有关农业方面的档案资料。

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满足国家工业化对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和重工业发展对资金积累的需求，在经济体制上，选择了以排斥市场商品交换关系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上用高度集中的计划机制逐步取代市场机制。在农产品流通领域对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与此同时，在农村全面开展农村合作化。在初期，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农村供销合作和农村信用合作是农村合作化的三种形式；强调一切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坚持自愿互利和循序渐进的方针。在生产领域，农业互助合作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围绕农业生产而为其服务”；并从实际出发，创造了不触动农民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些组织形式，经过实践检

验，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但是，上述正确方针和组织形式，并没有贯彻始终，1954年以后，加快合作化进程，提出合作化运动当作农村工作的中心，偏离了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到1955年夏季，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农业合作化进程产生了不同意见，把原来正确的方针，当作“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来批判。这样就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形成了超高速发展的猛烈浪潮。在迅速实现初级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又出现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升级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高潮，于1956年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这样，原来预计15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仅仅用了4年时间，提前11年就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实现了农民土地个体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历史性变革。应当指出的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并不是从我国农村实际出发，经过试验逐步推广的，它是在“高潮”中迅速推广普遍实行的，因此，它带来了许多困扰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高潮”刚刚过去，许多地方就发生了退社风潮，一些地方出现了改变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内部关系的“包产到户”新体制，受到农民的欢迎。但不久它被定性为“离开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则性路线错误”。由于过急过快地实现了农业合作化，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生产关系的变革，可以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过高估计了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些又成为1958年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理论根据，从而导致了更严重错误的发生。“一五”时期，农村经济体制另一项重要变化是，国家调集人力、物力和财力，加快了国营农牧场建设。1954年先后由军队转业官兵组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黑龙江农垦农场。还组织城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在黑龙江、新疆、华南开荒建立国营农场。全国其他一些省也在沿海、沿江、滨湖、滨河、荒山、荒漠以及大城市郊区开荒建设国营农场。到1957年国营农场发展到804个，比1952年增长43.1%；国营农场职工人数增加到44.1万人；耕地面积猛增到105.4万公顷，比1952年增长1.8倍。五年中新开荒耕地86.9

万公顷，比 1949—1952 年间开荒面积增长 2.39 倍。

## (二)

“一五”计划时期，国家在实行上述农村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还采取以下一些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1. 在流通领域实行主要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国家收购价格。从 1953 年到 1957 年间，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总指数（以 1950 年为 100）由 132.5 上升到 146.2，明显高于同期内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由 108.2 上升到 112.2 的速度。为满足纺织工业对棉花日益增长的需要，适当调整了粮棉比价，促进了棉花生产的发展。应当指出的是，由于实行了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生产的自发的市场调节，被限制到很小的范围——农村集市贸易，使其作用得不到发挥，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2. 实行稳定农业税收政策。政务院在《关于 1953 年的农业税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三年内农业税收指标稳定在 1952 年实际征收的水平上，不再增加；还规定实行“灾情减免”或“社会减免”。这样就使“一五”时期农业税稳定在 1952 年的水平上。1957 年全国农业税额为 29.67 亿元，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 5.5%，比 1952 年的 5.9%，减少 0.4 个百分点。

3. 增加对农业生产的投资。五年间，国家投资于农业基本建设的资金总额为 41.83 亿元，每年平均 8.37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43.6%。但是，分年考察则很不平衡，1954 和 1955 年不仅没有增加，还有所减少。1956 年 4 月 26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中论述了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强调了更快地发展农业、轻工业以后，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才有所增加。1956 年和 1957 年对农业的投资额分别达到 11.88 亿元和 11.87 亿元，比前三年的平均额 6.03 亿元，增长 97%。与此同时，国家财政支援农业的资

金也有所增加，五年总计金额 99.58 亿元，平均每年 19.92 亿元，占同期财政支出总额的 7.4%。国家银行对农业的贷款增加幅度较大，1957 年底，国家银行对农业的贷款余额 27.7 亿元，相当于 1952 年的 6.6 倍。

4. 开展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奖励增产模范。根据各地自然区划，分别制定不同地区不同作物的不同的奖励标准。突出奖励大面积增产和提高科学技术对增产作用的奖励标准，并强调奖励增产模范同农业合作化运动相结合。将增产模范的丰产经验推广到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中去。五年内涌现出大批大面积增产的典型，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5. 进行了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扩大了农田灌溉面积。政府在重点治理大江大河的同时，把组织农民开展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作为发展农业的重要措施。农业合作化的开展，促进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发展，五年内完成土石方 17.8 亿立方米，增加有效农田灌溉面积 738 万公顷。到 1957 年，全国用于排灌的动力设备增加到 4.1 亿瓦特，比 1952 年增长了 3.6 倍。五年间，结合江河治理，修建了上百座大中型水库及骨干排水河道。在农村普遍兴修小型水库的同时，有些地方还建设了小型水电站。1957 年全国农村小型水电站 544 个，发电能力 2 万千瓦，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4.55 倍和 1.5 倍。在群众性的水土保持工作中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尤其在水土流失严重的陕西、山西、甘肃、宁夏等省和自治区，通过在黄土丘陵打坝护坡，在高原沟壑修建梯田，在平原地区平整地埂，在山区植树造林，对防止水土流失起了重大的作用。

6. 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发展，增加对农用生产资料的投放数量。1957 年化肥施用量达到 37.3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3.8 倍；农药 14.9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8.9 倍；农用柴油 12.9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1.9 倍；用电量达到 1.4 亿千瓦小时，比 1952 年增长 1.8 倍；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 12.1 亿瓦特，比 1952

年增长 5.7 倍；农用大中型拖拉机 14674 台，联合收割机 1789 台，农用载重汽车 4084 辆，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10.2 倍、5.3 倍和 13.6 倍。

五年内，在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加强了新的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政府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从 1952 年的 232 个，增加到 1955 年的 7997 个。还建立了牲畜配种站、兽医防治站、农业拖拉机站等技术推广和服务机构。上述机构总结农业劳动模范增产经验，再以这些经验，指导农业生产技术改良。在农作物品种改良和推广、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农作物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的改良、土壤改良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第一，农作物品种改良和良种推广。在积极选育、繁育农家优良品种的同时，引进外来优良品种经过试验、示范，逐步推广。到 1957 年，全国粮食优良品种的播种面积所占的比重从 1952 年的 4.7%，提高到 55.2%。棉花优良品种播种面积所占比重从 1952 年的 50.2%，提高到 93.9%；油料作物和其他作物的良种播种面积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大。

第二，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和牲畜疫病的防治。五年间对历史上危害最大的蝗虫的防治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在 1952 年 12 月全国治蝗座谈会提出的由人力为主改为药剂为主的方针下，在全国建立了 23 个防治站，培训了 5 万多农民侦察员、机械手。1955 年，蝗虫发生面积 117.3 公顷，用药防治面积 86.5 万公顷，在新疆、河北、天津等地用飞机治蝗 6.7 万公顷，控制了蝗虫的危害。对水稻螟虫的防治，从 1954 年开始实行四季治理，在发生区建立治螟示范区，推广示范区的治螟经验，大大减轻了螟虫的危害。对小麦锈病采取组织育种、栽培和植保多学科联合攻关，培育出抗锈品种，控制了锈病的蔓延和危害。1957 年全国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面积 467 万公顷，比 1952 年增长 4 倍。在牲畜疫病防治方面，对耕牛危害最大的牛瘟到 1955 年就已经消

灭。到 1957 年已遏止牛炭疽病蔓延，猪瘟和猪丹毒也有了有效的防治方法。

第三，农作物耕作技术和栽培技术的改革。各地在改革中主要根据自然条件，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以增加农作物的总量。在南方稻区耕作栽培制度，进行了单季稻改为双季稻、间作稻改连作稻、籼稻改粳稻的改革。从 1954 年到 1956 年间，基本上把间作稻改成了连作稻，不少地方还将一季稻改成了双季稻。湖南、江西两省，1954 年双季稻播种面积仅占稻谷总播种面积的 22.9%，1956 年增加到 52.3%。福建、广东、广西三省双季稻也由 1954 年的 57.8% 上升到 1956 年的 69.8%。在淮河、秦岭以南和长江以北地区通过推广秋耕、深耕、适时播种、合理密植、保墒防旱、培育壮秧等栽培技术，扩大冬小麦、油菜，增加稻麦、稻油（菜）两熟面积。华北平原地区发展玉米与小麦、玉米与马铃薯的间作套种，增加玉米播种面积，促进了玉米生产的发展。1956 年全国玉米种植面积扩大到 1766.2 公顷，比 1952 年增长 40.6%，总产量达到 230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36.8%。

第四，改良旧式农具和推广新式农具。五年间主要进行了新式畜力农具的推广和旧式农具的改良。1953 年推广新式畜力农具双轮双铧犁、圆盘耙、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等 69 万多件。1954 年经国务院批准，进一步降低 13 种主要新式农具价格 15%—40%；颁布《新式农具统一管理办法》，改进推广工作，加强对农具手的技术培训，加快了推广速度。到 1957 年底，全国共推广新式畜力农具 468 万件，其中双铧犁、新式步犁、水田犁、山地犁 300 多万件。在推广新式农具的同时，农业拖拉机站也有重点地得到发展，现代农业机具逐年增加。

第五，土壤改良和增施肥料。五年间，对盐渍耕地进行普查，并结合水利建设，采取生物技术和水利工程相结合的措施，对部分盐渍耕地进行初步的改良。开展了对红壤土的考察和研究，为大面积开发利用和改良提供了条件。五年间，全国每公顷



耕地平均农家肥施肥量由 1952 年的 11250 公斤，提高到 1957 年的 15000 公斤。绿肥面积由 1952 年的 230 万公顷扩大到 1957 年的 341.9 万公顷。

### (三)

五年间，农业生产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957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 604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24.8%，平均每年递增 4.5%。1957 年粮食总产量 1950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9%，平均每年递增 3.5%。棉花总产量 164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5.8%。油料总产量 419.6 万吨，仅比 1952 年增长 0.1%，未完成原定计划。糖料总产量 1189.3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56.6%。茶叶总产量 11.2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36.6%。烤烟总产量 25.6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5.3%。水果总产量 324.7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32.9%。黄红麻总产量 30.1 万吨，比 1952 年下降 1.6%。蚕茧总产量 11.2 万吨，比 1952 年下降 8.9%。

在农作物发展的同时，畜牧业得到全面的增长。1957 年猪牛羊肉总产量 398.5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17.7%；大牲畜年底存栏数 8382 万头，比 1952 年增长 9.6%；生猪年末存栏数 14590 万头，比 1952 年增长 62.5%；羊年底存栏数 9858 万只，比 1952 年增长 59.6%。

林业，五年间造林面积成绩显著，达到 21102 万亩，超额完成了原定计划。1957 年林业总产值 9.3 亿元，比 1952 年增长 2.2 倍；1957 年主要林产品产量：橡胶 346 万吨，生漆 1700 万吨，油桐籽 49.4 万吨，核桃 10.3 万吨，都比 1952 年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渔业，全国水产品总产量 1957 年达到 312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86.8%，平均每年递增 13.3%；其中，海洋捕捞量 182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82%；淡水捕捞量 61 万吨，比 1952 年增长 29.8%；海水和淡水养殖量分别比 1952 年增长 1 倍和 3.07 倍。